时晨. 虚拟公共空间中的乡土公共性重建——基于L村微信群的考察［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1）：74-82.
SHI Chen.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ity in virtual public space——based on a study of L village WeChat group［J］. Journal of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2022，21（1）：74-82.
DOI：10.13842/j.cnki.issn1671-816X.2022.01.009

虚拟公共空间中的乡土公共性重建
——基于L村微信群的考察

时晨
（安徽财经大学 文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我国不少村庄出现空心化、原子化的趋势，基层乡村治理受到严重挑战，打破这一困局的关键在于重建已衰落的公共性。移动互联网能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虚拟公共空间就此诞生，“离散化”的村民再次相聚，社会关联重归紧密；村民在其间就公共事务展开共同讨论，公共性的建构由基层公权力唱独角戏变为多元主体的“共同协作”；虚拟公共空间也是博弈场，被赋权的村民通过协商、竞争形成制衡，权力结构得以优化，基层治理水平提升。由此可见，村民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信息生产、传播实践阻断了共同体的衰落趋势，为乡土公共性的重建带来可能。

关键词：移动互联网；公共性；微信群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16X（2022）01-0074-09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我国乡村迎来了剧烈的转型时期，不少村庄先后出现空心化、原子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村落秩序混乱、基层组织管理失范、村民对村落价值的认同感缺失等乱象，基层乡村治理受到严重挑战。乱象的具体原因可能多种多样，根本原因在于公共性的缺失[1]。公共性被称为“人类文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条件”[2]，对任何社会共同体都有深刻且广泛的影响，乡土社会自不例外。要应对基层乡村治理危机，重建乡土公共性是第一要务。

“公共性”一词原是抽象宽泛的概念，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对它进行过定义和解释。20世纪前“公共性”一词尚未出现，研究者以“公共”和“公”来指代。阿伦特（Hannah Arendt）直接对公共性做出论述，她将人类活动领域分成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具有公开性和公共性，公开性表现为可被看见和可被听见，公开性表现为实在性与共在性[3]。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性思想来源于阿伦特，但又对公共性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公共性等同于公共领域，包含批判性、沟通性、公开性诸要素[4]。西方学者对公共性的界定大都从价值规范出发，值得借鉴，但我国的国家与社会有“一致性”与“非对抗性”，因此公共性不具有批判性要素，实用主义色彩较浓[5]。与广义公共性相比，具体到乡土公共性的研究较少。近年来国内学界逐渐形成共识，认为我国乡村治理中丛林原则肆虐、治理能力弱化的问题归根结底为“公共性的空心化”所致，研究者们依据现实提出了让农民产生“社会联结”[6]、实施真正的乡村自治[7]、改变基层治理模式[8]等方案。也有研究者聚焦乡村公共空间与乡土公共性的关联，强调乡土公共性的生成离不开乡村公共空间这一社会基础[9]，村民在乡村公共空间中增强社会关联，重塑共同体意识，有效促进乡土公共性的建构[10]。因村民生产生活模式变迁，近年来传统乡村公共空间衰落势头日显，研究者开始从媒介与传播的角度聚焦QQ群、微信群和腾讯“为村”等社交媒体建构

收稿日期：2021-07-16 **修回日期：**2021-09-02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AHSKQ2019D074）
作者简介：时晨（1982-），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乡村传播学。E-mail：shinstar916@163.com

的虚拟公共空间。有研究者认为微信群协助村民实现了“线上同在”、情感“共振”和村务参与，推动了村落治理创新和共同体重构[11]。有研究考察村民如何通过社交媒介拓展话语表达空间、促进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变化、提高对乡村社区的认同[12]。这些研究虽没有直接将虚拟公共空间与乡土公共性联系，但社会关联、村落治理创新和公共参与等都属于乡土公共性的建构范畴[13]。也有研究者对网络公共空间与乡土公共性再生产做出了开创性研究，指出村民通过网络话语实践重建乡土舆论、促成共同行动，网络公共空间推动村民实现从“私”到“公”的转化，成功再生产了乡土公共性[14]。

近年来互联网在中国社会不断下渗，借助智能手机上的QQ、微信等社交媒体，村民也开始了“移动互联”生活。社交媒体平台超越了时空限制，建构出虚拟的公共空间，在乡和离乡的村民得以重聚；村民在其间就公共事务展开讨论，乡土公共性的建构不再是基层公权力的独角戏，而是多元主体的“共同协作”；虚拟公共空间提供了发声空间与渠道，被赋权的村民通过博弈形成制衡，优化权力结构，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由此可见，村民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传播实践阻断了基层乡村共同体的“离散化”趋势，为乡土公共性的重建带来可能。本研究拟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以一个中部省份的基层村落L村为样本，试图用“深描”（thick description）来“解读”（explication）该村村民于微信群中的话语实践及线下行动，探讨传播与乡土公共性之间的关联。

一、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公共性以个体为基础，但超越了极端个人主义。个体之间、个体与联合体之间不会互相排斥，而是共享利益、共同发展[15]。公共性的实现离不开联合体成员的普遍参与，成员的集体努力最终导向更大的“善”。公共性“着重于参与机制和公众基于该机制参与公共活动的过程，‘公’或者‘公意’在这种参与中达成时，具有公共性”[16]。公共性有多种生产方式，从传播的视角考察公共性的生产可分解出三个要素：公共领域向每一位符合条件的个体开放，他们享有均等的权利和机会。走出私领域的个体们在公共领域展开讨论，此为公共性的要素之一“公开”。在公共领域展开讨论，个体开始了由“私人”向“公共人”的转变，但只有就共同利益相关的事务展开广泛深入的协商后，公共性才会成功生产[17]。在这一过程中，“共同利益”、“共同参与”突显出公共性的“共有”要素。公共领域也是多元主体博弈的场所，具体实践中往往难以杜绝居强势地位的单一主体（通常为行政权力）在个人或团体层次的自利性行为[18]，居于弱势的主体通过横向结合形成自组织从而扩大话语权力，实现主体之间的制衡，既避免单一主体权力极化，也能避免主体之间的矛盾激化。此为公共性的“包容”，也是我国公共性生产与西方相区别的重要特性。经济学家英吉·考尔（Inge Kaul）曾围绕公共产品供给提出一套测量公共性的三角结构模型。模型的垂直轴测量“非排他性”，底部左侧轴测量“参与性”，底部右侧轴测量“公平性”[19]。英吉·考尔的三角结构模型为我们提供了参考，将它与公共性公开、共有、包容的三属性结合，本研究以“空间—主体—权力”为框架，从公共空间形态的更新、参与主体的扩充与权力结构的优化三方面对虚拟公共空间中的乡土公共性重建进行分析。乡土公共性有多种生产方式，本研究聚焦于自下而上的网络参与对乡土公共性的建构。

安徽省北部的L村是本研究的田野点。该村有农户505户，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680元，属中等收入行政村。该村符合中部村庄的普遍结构特征：由在外务工群体、在乡中坚农民和贫困农户组成，呈现出较普遍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20]。对本研究而言，L村也许不能作为中部地区全部乡村的“典型”，但至少能代表中部地区乡村的一种普遍“模式”。与城市相比，中部地区乡村的“通网”之路要晚得多。农村铺设网络较难，但“普遍服务”的目标不可废，到了2014年6月，工信部、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发文，共同组织实施“宽带下乡”工程。L村也搭上了“宽带下乡”的东风，不少农户以相对优惠的价格装了宽带，再配上路由器，WIFI信号可覆盖自建的楼房。L村村民的观念较为保守，不过随着国产智能手机价格的下调，中老年村民也成为移动互联网用户，他们尤其喜欢用微信，因为可以打语音电话，甚至可以“看到脸”

（视频通话）。L村村支书WHP于2016年上任就碰了个软钉子：他提出竞争市级美丽乡村建设重点示范村，应者寥寥，只能无奈放弃。2017年元旦刚过，村支书建了一个名为“团结一致新L村”的微信群，开始群内冷冷清清，但不久便成为L村村民公共交往的重要平台。群内成员已超过全村总户数，接近全村总人口的二分之一（田野调查时的数据）。成员既有村两委人员、在乡务农村民，也有长期在外打工的村民，体现出“同时在场”的优势。微信群能闲话家常，也能讨论公共事务，若有涉及公共利益相关事务，一天有上百条信息。群主原是村支书，后由村民投票选出，无论群主还是村两委都没有随便踢人出群的权限。可见L村微信群超越了时空限制，为村民提供了可以自由进出与发言、参与公共事务的虚拟公共空间。

传播学者凯瑞（James Carey）曾指出，从“意义共享”的视角看，传播建构了人类社会。传播并非在重现事实，而是在追寻意义[21]。具体到本研究，仅呈现村民们在微信群中的话语实践并不够，还需要进行“精细化”深描。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通过“建立关系、选择调查合作人、做笔录、记录谱系、绘制田野地图、写日记”，再对获取的社会行为和话语进行深度“解读”，展现意义结构呈现的系列过程是深描的一种尝试[22]。鉴于此，本研究将多元“行动者”的线上话语实践和线下行动置于特定背景下进行“精细化”描写，再解读其背后的社会意义。因此本研究选择了“有助于理解与研究对象有关的社会因素”的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两种具体研究方法[23]。

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均于2019年底进行。笔者于2019年11月1日加入“团结一致新L村”微信群，获取并保存了11月1日到12月31日2个月的聊天记录。从2019年12月初开始，笔者进入L村进行田野调查，在L村所在C镇的政府工作人员帮助下成立了报道人网络，对121名村民进行了深度访谈，其中包括对30位在外务工人员的线上访谈。笔者也主动参与了村民共同发起的一次决策活动，近距离观察了村民与基层村组织展开博弈的全过程。不过，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虽能获取丰富的一手资料，也要求观察者保持冷静与清醒，以免落入海量材料的陷阱。本研究对获取的各类文本进行综合描述性解释，只做最小限度的原始文本引用，力图呈现过程、事件本身的情况或规范，努力理性解读村民在虚拟公共空间中的话语、行为互动，剖析这些线上线下实践如何重建乡土公共性。

二、虚拟公共空间中的乡土公共性重建实践

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公共性存在。即使年代不同，公共性的生产过程都有一定相似之处：长期生活在某一共同体的个体有着相似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个体们聚集在田间地头、井边或茶馆等固定的公共空间，在其中展开公共交往，可以是日常互动，可以是严肃讨论甚至共同行动。不同利益诉求的个体通过话语和行动进行持续的协商与博弈，共同体的权力结构得以更新、公共秩序得以维护。

公共性的产生依托于公共交往，而公共交往发生于公共空间。所谓公共空间，具体到特定乡村社区，就是村民可以自由进入并互动交流的场所，如茶馆、广场、宗祠等；或是共同体内的制度化活动仪式，如婚丧嫁娶、村庄会议等。随着现代性对农村影响的不断加深，原本“稳定”的乡村也出现流动性增强、同质化减弱的趋势，L村也不例外。越来越多的中青年村民离村打工，有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户搬进村外购置的商品房，户籍在村里，人却处于“缺席”状态。同时，在乡村民因为生产生活日益多元，平时见面的机会并不多。曾经热闹的村文化活动中心、小卖部等公共空间变得门可罗雀。村民交往少了，人际关系也深受影响，“离散化”趋势日显。

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为微信群等虚拟公共空间的搭建带来可能。结合L村的经验事实，无论离乡还是在乡，村民通过手机微信群平台，实现在虚拟公共空间中的“共同在场”。在这一全新的空间形态中，通过公开的话语实践，社会联结成功再生产，乡土公共性有了重建的可能。围绕共同关注的公共事务，基层组织、在乡村民、务工人员等多元主体在线上展开讨论、协商，并延伸为线下行动。乡土公共性的建构由基层行政权力“唱独角戏”转变成

多元主体的共同协作，虚拟公共空间提供了发声空间与渠道，被“赋权”的村民获得与传统行政权力抗衡的“社会信息权力”[24]，促使传统政治权力调整自身定位，多元主体的力量得以制衡，权力结构得到优化，基层治理水平有所提升。

（一）虚拟公共空间强化公共联结

公共空间是培育公共性的载体，公共空间的变化必会对公共性的生产产生影响。在社会学范畴，公共空间被看成存在于特定共同体内部，且固定于相对特定空间之中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25]。当代乡村的公共空间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为场所类的实体公共空间，如水井边、村活动中心、村民广场等。村民可于其间自由交流，它们是维护村民社会关联的重要场所。二为仪式类的无形公共空间，如祭祖、祈福等一年一度的重要仪式，或是村民集体参与的红白喜事。但是，随着村民谋生手段、生活模式的多元化，白天村民忙着干活，到了晚上，村民也不再出门聊天，而改在家里看电视、玩手机游戏，红白喜事也逐渐简化了流程，在外打工的村民“礼到人不到”，在村的村民也只“随份子”。村民们忙于各自生计，原有的公共空间被荒废，公共交往失去了平台，L村的“离散化”趋势明显。

有学者指出，村庄公共空间的演变能真实地透视出乡村社会变迁的真实图像[26]。和中华大地上许多乡村共同体一样，L村的传统公共空间也逐渐衰落，但依托于移动互联网的微信群“团结一致新L村”构建了全新形态的公共空间。无论在乡还是离乡，村民都可以加入微信群，在群内发表观点、展开讨论。当然，微信群仅是平台，能否成功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归根到底在于村民在群中的交往实践。与L村距离不远的H村被选为省级美丽乡村建设重点示范村，L村人一直觉得“没啥好的”。2017年春节，不少村民受邀去H村参加一场婚礼，大受震撼。H村统一修建了别墅群，家家“楼上楼下”，户户“电灯电话”。水泥路铺到家门口，开龙头就有自来水。村支书拍了几十张照片发到微信群，让大家说说感想。当天去了H村的村民纷纷跟帖，夸H村大变样了，村支书趁热打铁，让大家聊聊“L村发展”。

2017年初微信群刚建立，只有村支书和会计等人零星发些信息，绝大多数村民只是“潜水”。村支书提出有关L村的发展问题，没想到激起了村民们的讨论热情。据关键报道人ZYY回忆，很多人说话很尖锐，丝毫不留情面。讨论持续了3天，所有有智能手机的村民都参与进来，在外务工人员也加入讨论。3天后，村支书让大家总结一下几天讨论的情况，最后村民得出的结论是：L村风气不好，大家有私心、不团结，“没把自己当L村人”。

村支书看讨论势头不错，于是开始每天在群里转发涉农政策解读等信息，村主任的妻子CHM则带头在群里发村里的花花草草照片，解释说是“发现L村的美”。因为CHM人缘好，不少人也跟着发送有关L村的照片。“团结一致新L村”一下有人气起来，一天当中都有人发图片、有人晒厨艺、有人转发笑话或是养生信息。虽说让村民几乎“全民参与”的是L村发展话题，后来群里常见的却是家长里短的琐碎信息，但它们都是村民围绕共同话题的话语实践，它将离乡与在乡村民联系在一起，滋生出一种“天涯共此时”的亲近感。而且厨艺照片、养生信息等话题的门槛较低，潜移默化中，村民的信息生产能力、媒介素养也得以提高。

L村传统的公共空间沉寂下来，微信群却构建了新形态的公共空间。“团结一致新L村”里的信息多半与公共利益关联不大，但村民自由加入、平等讨论的微信群实为一个多元主体同在的利益表达平台，内置高效运转的对话机制，是具有民主氛围的虚拟公共空间。在乡和离乡的村民通过移动互联网相互连接，在对全员公开的平台上分享信息、共同讨论，这样的话语实践看似琐碎，其实是一种可实现意义共享的公共交往，交往过程中村民间的社会关联被重新加固。同时，村民个体在公共空间中的话语因“可被看见”，能促使个体对自身言行进行持续反省，从而顺应“能群”的本质[27]。话语实践更是一种“热身”训练，随着参与群讨论的村民越来越多，群话题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涉及L村公共事务的话题也开始进场。

（二）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

“团结一致新L村”微信群建立之初信息寥寥，因“L村发展讨论”的话题突然热闹起来。

大讨论结束后，群里消息大都是玩笑、打招呼，围绕着公共事务的“硬核”话题并不多。但正如传播学者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所言，任何一种新媒体都有重建全新社会场景的能力[28]。L村村民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在群内简单评论、一键转发都是他们对全新交流方式的学习和适应，直接@群里成员的方式又让他们找到了面对面交流的感觉。在“L村发展讨论”话题结束半年后，一场村民纠纷让“团结一致新L村”的公共性突显出来。

L村因为没能从县里争取到后续经费，公共垃圾池数量较少。有的村民图省事，偷偷把垃圾扔在路边，盛夏暑气蒸腾，蚊蝇乱飞。村民WWQ家住路边，深受其害。一天WWQ又发现了垃圾，WWQ儿子在群里破口大骂，还把同住路边的几家都@上了，让“受害者”一起来“噘”（皖北方言，骂人）。有一家孩子前阵子害痢疾，卫生院不敢治，只能连夜开车到市里医院看。孩子爷爷看到信息气不打一处来，直说“苍蝇乱飞，不卫生，家里老人孩子都受害”！本来大多数村民都只是围观，想到苍蝇乱飞确实是隐患，也开始发言。还有人@村支书和村主任，问为什么公共垃圾池那么少，清理也不及时。于是，在微信群这一公共空间中，一场因少数村民缺乏公德心而起的纠纷变成了涉及公共事务的讨论。

曼纽尔·卡斯特尔曾言，网络天生具有“去中心化”特质，它让权力分散，不再垄断于少数人手中[29]。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村民有了在网络公共平台上发声的可能，但对大多数农民而言，网上发声有一定的技术与经济壁垒。移动互联网降低了农民“触网”的门槛，乡村的信息传播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流动，农民也成为信息发布者。在L村，村支书WHP原将微信群当成“团结人”的工具，当村民们认真参与公共事务时，反而“一头汗，真有点被动”（WHP语）。L村的垃圾池是县里拨款修建的，而日常垃圾清运费需要村民共同承担，有的村民家离垃圾池远，不愿出钱，一来二去，不出钱的村民越来越多。清洁员拿不到钱，只能靠村组织隔三岔五补贴一点，因此垃圾池总是不干净。要想彻底解决垃圾乱扔问题，必须多建垃圾池，保证清运费用。

吸取了“美丽乡村建设”申报的教训，村支书决定不开现场会，改在“团结一致新L村”微信群里说明情况。会计整理了村组织经费支出材料，计算出L村每户每月需交2元钱，保证垃圾天天清理。如在村里加修两处垃圾池，每户需缴纳20元钱，所有材料一并发布在群里。原本村信息公开都是纸抄写了贴在村委会外，这次特殊的“信息公开”引发了村民的兴趣，看到金额不多，同村支书走得近的村民表示愿意交钱，村支书又@独居老人和有病人的家庭，“别自己难为，有困难村里肯定给你们想办法”。随后，群里展开了困难家庭如何支付垃圾清运费的讨论，一家种植大户提出捐款100元代几家困难户交清理费。同困难户沾亲的农户有点“面子上挂不住”表示要帮自家亲戚交钱。村支书也说捐款100元，直接放到清理费账上。几天后，清扫费和新建垃圾池的费用收齐，加上捐赠，比预算还多出一些，可以滚动到下年使用。

西方学界将公共性视为国家—社会二元分化之产物，因此对公共性的对抗性因素较为关注，若将西方观点原封不动用于中国，难免有“具体情境错置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30]的风险。我国的国家与社会具有根本一致性，政府在公共性建构中起主导作用，遍布中华大地的诸多民生工程就是最好的例证。具体到乡土公共性，基层政府是公共性建构的主导力量，利益切身相关的村民主体往往处于被动旁观的位置。可基层政府可调动资源有限，难对村庄公共事务相关问题做出及时反馈，公共产品供给不稳定，公共性的建构长期处在低效水平。若能将村民从公共性建构的被动旁观者变为积极参与的主体，将大大改善基层组织势单力薄的困境，进而提升乡村治理的有效性。L村村民依托“团结一致新L村”微信群进行公共事务参与的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传统的农村传播是自上而下的单向形式，无法激发农民的能动性，同时，因传统公共空间衰落，村民公共交往减少，曾起着维护乡村秩序作用的公共舆论难以形成。久而久之，农民对公共事务缺乏参与感，抱着“各扫门前雪”的心态，甚至蓄意“搭便车”。L村的微信群给村民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平台，村民就共同利益相关的事务进行实时的信息生产与解读，形成公共舆论、发起公共行动动员，并成功延伸

为线下行动，有效弥补了基层组织单一行政力量的缺陷，有助于全体村民获得更好的公共产品。村民借助微信群这一虚拟公共空间化解了传统行政力量的保守和低效倾向，乡土公共性的建构由“官”一手包办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转变，主体的扩大突显了乡土公共性的“共同”特性，有助于因离散化趋势一度衰落的乡土公共性重建。

（三）基层乡村权力结构的优化

“赋权”（empowerment）又称增权，最早出现于社会学研究领域，20世纪60年代，社区传播学的研究者将此概念引入传播学领域。进入互联网时代，它被细化为“技术赋权”，具体到乡村治理语境，借助互联网技术掌握了媒介近用权并充分行使表达权的村民就是被赋权的对象。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浪潮无远弗届，“经济至上”也成为不少村民的信条。富户就是“能人”，不少村民对能人存在盲信，认为有“有路子”，能为村里争取资源。L村有几个开仿古玉器加工厂的老板，其中一个老板是上一任村主任的表弟，得了不少“方便”，包括廉价租了村里闲置地当玉器加工场地。玉器加工粉尘飞扬，如果没有正规的环保措施，会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但L村村民对村里事务不太关心，且又“崇拜”甚至“忌惮”能人，个别人私下嘀咕，也不敢在公开场合提反对意见。前些年这类事并不少见，村里大小事务村民无权管，由村干部和能人们一手包办。

L村的现象并非特例。在我国，鼓励由村民进行“自治”的治理模式自20世纪90年代铺开，但具体到基层乡村，单一行政主体的权力过大，村组织的决策往往无法反映村民的真实诉求，村民也难以展开有效监督，真正意义上的村民自治难以实现。到了后农业税时代，为争取有限的资源，村民对基层组织的依赖进一步加深。有学者将此种状况称为“独白”VS“冷漠”：基层政府与精英联合垄断了决策权，弱势的村民无从表达诉求，以致村民认为政策和决策都与自己无关[31]。“独白”VS“冷漠”导致了恶性循环，越发扩大了基层政府的寻租空间，严重影响乡村治理的实效。

L村不常开村民大会，偶尔开会村民也不爱参加，大会成了村干部和“能人们”等政治、经济精英的舞台，而“团结一致新L村”为草根村民提供了发声场地。2019年11月，出租地到了重新续约的时候，村民们开始在群里提起疑问。笔者当时在L村进行短期田野调查，近距离观察了村民质询、村组织答复、村民集思广益和行使决策权等现象及过程。这一过程贯穿起来，正是一个基层乡村共同体的村民主体在虚拟公共空间中行使表达权，与基层政府展开博弈，进而改善乡村治理实践的过程。

L村的“能人们”常用送礼品、请吃饭的手段拉拢部分村民，收了好处的村民也不怕别人“在背后讲难听话”，“能人们”和村组织堂而皇之地垄断了决策权力。村支书年龄不大，还和有些“能人们”沾亲带故，按期续约应该十拿九稳。但在“团结一致新L村”微信群中，不少村民提出了异议。离乡村民也表明了态度。L村在外打工的村民不少，他们不太回乡，对L村的大小事务颇为疏离。“团结一致新L村”建起后，他们也被拉进群，群里不时有人发村里的照片，说些家常，他们毕竟有父母在乡，觉得和L村的距离也拉近了一些。上次垃圾清运费捐款，就有离乡的村民慷慨解囊，这次转租闲置地，他们利用自身资源通过联系、甄别、选择租户，提供了各种信息与方便。反对续租的村民甚至另拉了一个名为“公平公正转租”的微信群进行信息传达和动员，在乡和离乡村民形成合力，将村组织长期包办的租地问题变成了与全体村民利益相关、需要共同决策的大事。最后全体村民在“团结一致新L村”微信群内投票，没有智能手机的村民由别人代投，并注明姓名。唱票结果就是仿古玉器加工厂等租户不再续约，由来自市区、甚至外地的租户替代。

围绕着续约一事，不少村民在微信群内的话语清晰明白，可见“团结一致新L村”微信群建立以来，在日常话语实践中，不少村民熟练掌握了在虚拟公共空间中发言与讨论的能力。如果把微信群当成现实乡村社区在虚拟空间中的投射，在这一权力关系结构中，他们已从被动变为主动。多元主体同在的虚拟公共空间超越了时空距离，持同样立场的村民甚至可以依托微信群结成有共同目标的“反对组织”，在其中共享信息、配置资源并展开动员。虽然它只是短期组织，目

标达成后随时可能解散，但作为“反对组织”一员的自我认知大大提升了村民个体调动社会资本参与博弈的意愿与可能性，从而影响了整个博弈行动的走势。在群内的信息流动中，个体村民的话语权力不断汇集，形成了横向的社会信息权力，原本弱势的村民得以与传统行政权力抗衡。传统行政权力也不得不重新调整定位，变“俯视”为“平视”，这必然带来权力结构的动态调整。个体村民依托虚拟公共空间结为群体，实现力量汇集，之后与代表传统行政权力的基层组织展开平等对话，督促其履行义务、改善公共产品供给、优化公共资源分配。他们由旁观者变为能动的参与主体，连一位常住长三角某市、拥有数千万资产的村民也颇有感慨地说，无论在乡离乡，都是L村人，离乡村民“离乡不离心”，关心村务“责无旁贷”。基层组织也不再掌握“话语霸权”，不得不认真对待被网络技术“赋权”的村民群体，并对传统乡村治理中因长期沿袭而视而不见的“惯习”（habitus）做出重新衡量与取舍。在乡村民、务工人员、基层组织人员等多元主体的相互制衡能促进基层乡村共同体诸多公共事务的改善，优化基层治理水平。基层治理实践也是乡土公共性建构的组成部分，所以治理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包容性乡土公共性的生成。

三、结论与讨论

从公共性的起源上看，它源自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后来转化为个体与群体，也就是私与公的关系。互联网的兴起模糊了公与私之间的间隔，也为公共空间增加了新的类别。具体到基层乡村共同体，在乡与离乡的村民通过移动互联网连接，建立起全新形态的公共空间，以话语实践的方式互动协商，或转化为公共行动，多维度推动原本衰落的乡土公共性重建，最终导向乡村治理的“善治”。虚拟公共空间既是共同体公共交往平台，又是村庄内外的基层组织、务工人员、在乡村民等多元主体互相博弈的权力场域，更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实践场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乡村公共空间是乡土公共性的生成场所，对乡村秩序的维持、共同体的维系至关重要。传统公共空间的衰落加速了乡土公共性的萎缩、村庄逐步走向失序，与“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有效治理目标渐行渐远。平等、公开、有效的参与渠道与平台是实现公共性的重要保证，而公共性的重构正是解决乡村治理失范问题的根源[32]。基于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虚拟空间内置高效的沟通渠道和平台，提供了乡土公共性重建的新路径，为实现有效治理提供了新的可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基本形成了乡镇以下实行村民自治的“乡政村治”模式。在农村复杂的治理环境的影响下，村民自治机构逐渐半行政化，“自治”徒有其名[33]。要达成有效治理，需要实现基层村组织与村民之间的高效有序互动，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乡村治理的转型。通过对L村的考察可见，基于微信群的虚拟公共空间能重造村民社会联结、激活公共参与、助推权力结构优化，它能催生公共性，更能推动传统基层治理向多元主体能动参与式基层治理的转化。虚拟公共空间具有公开性，村民在虚拟公共空间公开发表观点、施加压力、发起行动。虚拟公共空间提供了便利的沟通渠道，有助于规避村民因无法正常表达要求而引发的干群矛盾激化，有效维护乡村秩序。虚拟公共空间也提供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公开场域，更多村民参与到治理过程中，扩大了乡村治理主体的范围。虚拟公共空间让行政权力与村民“同在”，一方面改变了自上而下、单向的信息传播模式，克服了传统乡村治理中信息传递低效的痼疾，提高了资源整合与配置的效率，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实现了治理主体的相互制衡，村民得以对基层行政权力实施有效监督，遏制了行政权力的自利性导向，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可以说虚拟公共空间提供了乡土公共性生产的新路径，有助于实现有效治理，为基层乡村的振兴奠定了基础。

在过去的乡村，村民生活在同一共同体中，通过密集的日常交往形成相似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思维模式[34]。因此传统乡土社会的公共性以地缘与血缘为基础，“沾亲带故”、“老邻居”才可“论公”。当乡村流动性不断增强时，村民间的交往逐渐减少，传统公共空间不断萎缩，乡土公共性也走向衰弱，严重影响到基层乡村治理的有效性。近年来移动互联网在我国农村地区不断下渗，也逐渐嵌入基层农村结构，基于移动互联

网技术的QQ、微信等社交媒体将“离散化”的村民重新联结，生成新的人际关系网络，进一步构建出超时空限制的虚拟公共空间。为乡土公共性带来了全新的建构可能。本研究属于微观层面的个案研究，对L村“团结一致新L村”微信群的考察可能并不能得出普适的结论。不过，正如费孝通所言，个案研究像“解剖麻雀”，从而让我们对与个案类似的现象和问题形成更深刻的了解[35]。

参 考 文 献

[1] 武中哲，韩清怀. 农村社会的公共性变迁与治理模式建构[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15-22.

[2] 田毅鹏. 村落过疏化与乡土公共性的重建[J]. 社会科学战线，2014（6）：8-17.

[3] 汉娜·阿伦特. 人的条件[M]. 竺乾威，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52.

[4] 尤尔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曹卫东等，译.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24.

[5] 田毅鹏. 东亚“新公共性”的构建及其限制——以中日两国为中心[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2005（6）：65-72.

[6] 郭明. 虚拟型公共空间与乡村共同体再造[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30-138.

[7] 田毅鹏.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村“流动的公共性”的构建[J]. 当代社科视野，2009（9）：53.

[8] 武中哲，韩清怀. 农村社会公共性衰落的显性后果与公共性构建设想[J]. 党政视野，2016（4）：48.

[9] 张诚，刘祖云. 乡村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困境及其重塑[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1-8.

[10] 应小丽，钱凌燕. 非农化背景下乡土公共性的再生产与乡村治理变革[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50-55.

[11] 冉华，耿书培. 农村社会变迁中村落共同体的线上建构——对宁夏中部Z村的考察[J]. 开放时代，2021（3）：180-192.

[12] 牛耀红. 移动传播时代：村民网络公共参与对乡村社区认同的建构[J]. 社会学评论，2017（1）：36-46.

[13] 周重礼. 网络公共空间再造乡村公共性——以D村“行政外生型”微信群为例[D]. 长春：吉林大学，2020.

[14] 方晓红，牛耀红. 网络公共空间与乡土公共性再生产[J]. 编辑之友，2017（3）：5-12.

[15] 郭湛，王维国，郑广永. 社会公共性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0-96.

[16] 李友梅，肖琪，黄晓春.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J]. 中国社会科学，2012（4）：125-139.

[17] 詹姆斯·博曼. 公共协商：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M]. 黄湘怀，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35.

[18] 祝灵君，聂进. 公共性与自利性：一种政府分析视角的再思考[J]. 社会科学研究，2002（2）：7-11.

[19] 英吉·考尔等. 全球化之道——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管理[M]. 张春波等，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82.

[20] 夏柱智，贺雪峰. 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J]. 中国社会科学，2017（12）：117-139.

[21] 詹姆斯·凯瑞. 作为文化的传播[M]. 丁未，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5.

[22] 克里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纳日碧力戈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6.

[23] Wang P. Methodologies and methods for user behavioral research[J]. Annu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1999（34）：53-99.

[24] 刘少杰. 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变迁[J]. 学术研究，2012（10）：14-23.

[25] 曹海林. 村落公共空间与村庄秩序基础的生成——兼论改革前后乡村社会秩序的演变轨迹[J]. 人文杂志，2004（6）：164-168.

[26] 曹海林. 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村落公共空间——以苏北窑村为例考察村庄秩序重构的一项经验研究[J]. 中国农村观察，2005（6）：61-73.

[27] 张良. 村庄公共性生长与国家权力介入[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24-32.

[28] 廉思，周媛. 文化领域新社会阶层的利益表达：困境与机制——基于公共能量场理论的分析[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83-91.

[29]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等，译.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3.

[30] 李金铨. 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M].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30.

[31] 胡卫卫，辛境怡，于水. 技术赋权下的乡村公共能量场：情景、风险与建构[J]. 电子政务，2019（10）：117-124.

[32] 胡雪，项继权. 乡村治理转型中基层政权公共性的重构[J]. 云南社会科学，2018（4）：45-52.

[33] 李小艺，杜明高. 新时代乡村治理转型的逻辑及其呈现模式——以新化村、花岩村、海坪村为例[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39-45.

[34] 王斌. 社区传播论：新媒体赋权下的居民社区沟通机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51.

[35] 费孝通. 费孝通学术文集[C].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55.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ity in virtual public space ——based on a study of L village Wechat group

SHI Chen

（*School of Languages & Media*，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China*）

Abstract：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many villages in China have become hollowed out and atomized. Grassroots village governance has been seriously challenged. The key to breaking this dilemma is to reconstruct the declining publicity. The mobile Internet can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ime and space，and virtual public space emerged . The "dicentalized" villagers gather again，and the social connection become close again；Villagers discuss public affairs in the virtual public space，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ity has changed from a one-man show of the public power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to a “co-oper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Virtual public space is also a place for gaming where empowered villagers form checks and balances through negotiation and competition，the power structure is optimized，and the grassroots governance level up.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villagers′ information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practices based on mobile Internet have blocked the decline of the community and brought the possibility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new type of rural publicity.

Keywords：Mobile Internet；Publicity；Wechat group

（编辑：牛晓霞）